

汉代的上计制度

所谓上计，就是地方政府向朝廷汇报当地的社会经济与财政收支的基本情况，为国家编制财政预算提供依据。我国的上计制度源远流长。战国时期，各国即有“上计”或“听计”的记载。《吕氏春秋·知度》即记：“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这是赵国县令上计之例。《韩非子·外储说右》记：“田婴相齐，人有说王者曰：‘终岁之计，王不一以数日之间自听之，则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闻之，即遽请於王而听其计，王将听之矣，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王自听计，计不胜听，罢食，后复坐，不复暮食矣。田婴复谓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有为劝勉矣。’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计。王自听之，乱乃始生”。这是齐王亲自听计之例。《商君书·禁使》记“夫吏专制决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计书以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史记》卷七九《范雎传》亦记：秦昭王时，王稽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仓律》也规定：“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餽食者籍”，说明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便有地方官吏上计与君主听计的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执行上述上计制度。《史记》卷九六《张苍传》即载：“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所以，汉初萧何为相国，即荐张苍为“计相”，并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

汉代上计制度更完善，《周礼·春官·典路》郑众注就提到，“汉朝上计律，陈属车于庭”。卫宏《汉旧仪》也记载：“朝会上计律，常以正月旦，受羣臣朝贺”^①。只可惜汉代的《上计律》已失传，仅留下这一律目。汉代的传世文献，对汉代的上计制度也未做系统记载。但综合汉代传世文献的许多的零散记载，我们还能描述出汉代上计制度的大概。

1、计吏的选派

西汉时期，郡国上计都是由郡丞或王国长史承担，随行人员则可能包括与上计工作有关的掾史、卒等^②。因而史籍记西汉上计时，常称“郡国守丞、长史上计”^③，或“郡国上计长吏、守丞”^④，或将守丞、长史等统称为“上计吏”^⑤。这里所谓的“守丞”，有的学者认为是太守与丞，韩连琪先生已论其非^⑥。还有学者认为此“守”字表示“非本职而兼领事”。

“‘守丞长吏’或‘长吏守丞’，即由长吏代理丞上计中央”^⑦。我以为，此说亦不确。所谓“守丞”，乃指太守府之丞，亦即后来习称的“郡丞”。疏勒河流域出土的汉简就有一支（第20号）记载：“永光五年六月辛卯，敦煌太守丞禹谓玉门都尉 \square ”^⑧。尹湾汉墓出土的西汉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前后的东海郡《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也显示：时郡太守府（太守府）、郡都尉府与该郡所辖的县、侯国、盐官、铁官等都设“丞”。县、侯国、盐官、铁官等之“丞”，迺称为“丞”，其秩在二百石至四百石之间。独太守府之“丞”与都尉府之“丞”分别称为“太守丞”与“都尉丞”，秩六百石。显而易见，所谓“郡国守丞”，既非

^① 《玉海》卷六五《律令》。

^② 参见韩连琪《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文史哲》1978年第三期；葛剑雄《秦汉的上计和上计吏》，《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二辑。

^③ 如《汉官旧仪》卷上。

^④ 如《汉书》卷八九《循吏·王成传》，《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

^⑤ 《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记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京兆尹张敞舍鹞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事便将“郡国上计长吏、守丞”换称为“上计吏”。

^⑥ 说见韩连琪《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文史哲》1978年第三期。

^⑦ 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一期。

^⑧ 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第3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指郡之太守与丞，亦非指以它官代行丞职务者，而是指郡之“太守丞”^①。因为王国置“相”与“长史”。“相”相当于郡太守，其长史应即相当于郡太守丞。这里还要谈谈“长史”与“长吏”问题。汉代“史”与“吏”不仅字形相近，其义亦常相通。如佐史即常写为佐吏。但就“长史”与“长吏”而言，两者并不相通。“长史”是官称，“长吏”则表示一定的秩级。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5年）五月诏即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②。可见，六百石以上吏，都是“长吏”。六百石以下，大约只有县尉、县丞可称为“长吏”。《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即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③。可见，县长与县丞、县尉，其秩虽不及六百石，但县长主一县之政，县丞“署文书，典知仓狱”^④，为县令、县长的副手，县尉“主盗贼”，负责维持一县治安，所以都算“长吏”。除此之外的县一级吏员，都是“少吏”。

再看太守府的吏员构成。《汉书·百官公卿表》未记太守府的吏员构成及其秩级。尹湾汉墓出土的西汉东海郡吏员簿则记：东海郡“大守吏员廿七人：大守一人，秩口口口口，大守丞一人秩六百石，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九人，用算佐一人，小府啬夫一人=凡廿七人”。东海郡吏员簿，二百石以上吏皆注石数。大守府的“卒史”、“属”、“书佐”、“用算佐”、“小府啬夫”未注石数，说明大守府的“卒史”、“属”等可能只是百石之吏，有的可能连百石吏都不是^⑤。也就是说，太守府除太守为二千石外，只有太守丞一人堪称“长吏”，其余包括被称为“郡之极位”的功曹在内的诸掾史，都只是百石或不及百石的“少吏”^⑥。可见，太守府根本就没有可以代行郡丞职务的“长吏”。换言之，西汉时期郡国的上计，都应是太守丞与王国长史亲行。直至西汉末年都是如此。《后汉书志》卷二四《百官志》注引《汉旧仪》即曰：“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2年），以丞相为大司徒。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公出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记室掾史一人大音读敕毕，遣敕曰：‘诏书数下，禁吏无苛暴。丞、史归告二千石，顺民所疾苦。……诏书无饰厨养，至今未变，又更过度，甚不称。归告二千石，务省约如法’。此时‘上计’者仍是郡国守【丞】、长史；恭听诏敕，负有‘归告二千石’之责者，也仍是‘丞、史’，而此‘丞、史’无疑即是‘郡国守丞、长史’的简称。

王莽时期郡国上计情况不详。东汉以后，则是郡国“岁尽遣吏上计”。从此以后，就不再见“郡国守丞、长史上计”的记载。也就是说，东汉郡丞与王国长史已不再亲自赴京上计，而是由郡守、王国相选派级别远低于守丞、长史的掾史级的少吏赴京上计。

东汉时期，郡国选派赴朝廷上计的官吏，仍常通称为“上计吏”、“计吏”或“上计掾史”。一郡可能有几个计吏。谢承《后汉书》卷三《应奉传》记：“奉少为上计吏，许训为计掾，俱到京师”。《三国志》卷一一《邴原传》注引《原别传》曰：东汉末，邴原“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时鲁国孔融在郡，教选计当任公卿之才，乃以郑玄为计掾，彭璆为计吏，原为计佐”。《隶释》南阳太守秦颉碑阴铭记：“上计掾平氏朱谅季平，上计掾口口育子和，上计史宛卓韶、伯，上计史宛口芟口口”。说明一郡之中，可以同时有计掾、计吏数人。所谓计掾，应指太守府掾史被委以上计之任者。计吏、计掾、计佐并存时，“计佐”顾名思义，

^① 《后汉书志》卷二八《百官志·州郡》注引《古今注》就提到建武“十四年，罢边郡太守丞，长史领丞职。”

^②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③ 《汉书》卷五《景帝纪》载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3年）四月诏称“县丞，长吏也”。证明县尉、县丞虽不及六百石，但县丞是县令的副手，县尉掌维持一县之治安，所以也被视为“长吏”。

^④ 《后汉书》志卷二八《百官志五》。

^⑤ 参见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四期。

^⑥ 都尉府也是如此，除都尉与都尉丞两人为六百石以上（含六百石）的“长吏”外，其他人都是百石或百石以下的“少吏”。

应是郡国上计时的辅助人员。计吏、计掾并置时，计掾中之一人为郡国上计的负责人。据统计，传世文献所见的东汉计掾、计吏、计佐共38人^①，其中，确知其原先职务的计7人（皇甫规、刘翊、孙资等3人，以“郡功曹”任“计掾”或“计吏”，甘宁、贾洪以“郡吏”为“计掾”或“计吏”，夏承以“五官掾功曹”为“上计掾”，邴原以“郡功曹主簿”为“计佐”。看来，以郡功曹掾史为“计掾”、“计吏”者较多。这是因为郡级诸掾史中，功曹史“主选署功劳”，地位最高，被誉为“主吏”^②、“郡之极位”^③，最有资格担任上计之任。

东汉的计吏、计掾等，秩级都很低，都只是太守府的掾史之属，都是百石少吏。但郡府选派计吏、计掾等都很慎重，因为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朝廷的公卿大臣，计吏、计掾应对是否得体，对郡特别是对郡守关系重大。计吏、计掾本身，对于上计之事也看得很重，因为这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仕途。东汉的计吏有可能被朝廷留为“郎”，即后补官吏^④。有的计吏、计掾还被朝廷直接选用为县令、长之类的长吏。如东汉王逸，“元初（114~119）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⑤；应奉由上计吏被举茂才，后历任太守、司隶校尉等职^⑥；樊显由蜀郡计掾而为鱼复长^⑦；度尚由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⑧；皇甫规由上计掾上书求自效击羌，未果，后举贤良方正，历任尚书、太守等职；刘翊，汉献帝时举上计掾，到长安，诏书嘉其忠勤，特拜议郎，迁陈留太守^⑨；刘劭，建安中，为计吏，诣许，结识尚书令荀彧等，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曹魏时为常侍，赐爵关内侯^⑩；韦诞，“建安中，为郡上计吏，特拜郎中”，曹魏时历任太守、侍中、中书监等职^⑪；孙资，东汉末在河东“署功曹，举计吏”，为尚书令荀彧所赏识，历任县令、参丞相军事等职^⑫。相比之下，西汉就未见此类记载，因为西汉上计的太守丞、王国长史本来就已经是六百石的长吏。秩级比三百石的郎中、四百石的尚书郎、三四百石的县长等已经高了很多，自然不会舍高而就低。

2、上计时间与朝廷受计活动

“汉时八月案比而造籍书”^⑬，“计断九月”^⑭，以每年十月到翌年九月为一个财政年度。因而郡国遣吏上计的时间就在“计断九月”之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以正月为岁首后，仍然是“计断九月”，直至东汉，仍然如此。（居延汉简中就有一条大司农丞簿：“建昭元年十月尽二年九月”。）因路途远近不同，各郡国遣吏上计的时间也不同，但都要赶在正月旦之前到达京城，所以史书仅记为“岁尽遣吏上计”^⑮。

上计吏到达京城后，由大鸿胪接待。大鸿胪还负责郡国上计的典礼，《后汉书志》卷二五《百官志》即载：“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郊庙行礼，赞导，请行事，既可，以命群司。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

^① 葛剑雄《秦汉的上计和上计吏》（《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二辑）附表列出36人。本文据《后汉书志》卷二《律历志》及其注引《袁山松书》另增陈晃、刘洪两人。

^②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萧何为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名谒木牍，“东海太守功曹”亦常被称为“主吏”。

^③ 《后汉书》卷四五《张酺传》注引《汉官仪》曰：“督邮、功曹，郡之极位。”

^④ 《后汉书》卷五四《杨震附杨秉传》载：“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帑臧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凯觎之端”。可见此前“计吏留拜为郎者”数量之多。杨秉上言后，“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

^⑤ 《后汉书》卷八〇《王逸传》。

^⑥ 《后汉书》卷四八《应奉传》及注。

^⑦ 《后汉书》卷三一《张堪传》。

^⑧ 《后汉书》卷三八《度尚传》。

^⑨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刘翊传》。

^⑩ 《三国志》卷二一《刘劭传》。

^⑪ 《三国志》卷二一《刘劭传附韦诞传》注引《文章叙录》。

^⑫ 《三国志》卷一四《刘放附孙资传》注引《资别传》。

^⑬ 《周礼·地官·小司徒》贾公彦疏。

^⑭ 《后汉书志》卷二八《百官志·州郡》注引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改以十月为岁首。

^⑮ 《后汉书志》卷二八《百官志·州郡》。

四方来，亦属焉”。

西汉丞相“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①，负责郡国上计。东汉改丞相为司徒，即由司徒主持受计。《后汉书》卷八〇《赵壹传》即载东汉光和元年（178）司徒主持受计的场面：赵壹“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令左右往让之曰：‘下郡计史而揖三公，何也。’对曰：‘昔酈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则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因问西方事，大悦，顾谓坐中曰：‘此人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坐’。”

前面讲的只是丞相、司徒主持的受计仪式，真正的审核集簿（计簿）应该是逐郡分别审核。西汉初萧何任相国时，曾以张苍为计相，居相府，主领郡国上计事。张苍改任淮南相后，不再设“计相”，但相府仍有专门机构负责郡国上计事。西汉相府的集曹就是其中之一。《汉书》卷八一《匡衡传》载：“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阡陌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匡衡才发现原先多要四百顷（多收了四百顷的“田租”）。至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匡衡署主簿陆赐为集曹掾，想掩盖此事。翌年治计时，陆赐想通过举发上计之簿，令郡改从平陵佰以为定实。未果。匡衡反而落个“专地盗土”的罪名，被削职为民。由此可见，西汉相府的集曹有审核郡国计簿之责。

《汉旧仪》载：“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2年），以丞相为大司徒。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公出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计室掾史一人大音读敕毕，遣敕曰：‘诏书数下，禁吏无苛暴，丞、长史归告二千石，顺民所疾苦，急去残贼，审择良吏，无任苛刻。治狱决讼，务得其中。明诏忧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帅劝农桑，思称厚恩，有以赈赡之，无烦挠夺民时。公卿以下，务饬俭恪，奢侈过制度，日以益甚，二千石务以身帅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请谨以法，养视疾病，致医药务治之。诏书无饰厨养，至今未变，又更过度，甚不称。归告二千石，务省约如法。且案不改者，长吏以闻。官寺乡亭漏败，垣墙阤坏不治，无办护者，不称任，先自劾不应法。归告二千石听。’”^②这里所说的“计室”很可能就是此前丞相府的“集曹”。“计室掾史”（“计室掾史”）或即此前集曹主事之掾史。

东汉尚书系统“典天下岁尽集课事”^③的三公曹，也是审核郡国计簿的机构。

御史大夫“掌副丞相”^④，监察百官，也负有审核郡国计簿的职责。郡国上计时，御史大夫还单独接见上计者，《汉官旧仪》卷上即载：“大夫见孝廉、上计丞、长史，皆放官（宫）司马门外，比丞相掾史白录”。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二月诏还针对其时“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的实际情况，特指示“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⑤。

《后汉书志》卷二四《百官志·司空》引《汉旧仪》还记载：“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曰：‘诏书数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务於得中，恶恶止其身。选举民侈过度，务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这也表明，御史府不仅参加审计，而且在审计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大司农掌钱谷收支，“大司农中丞，管诸会计事”^⑥，也自应参加对郡国上计的审计。

^① 《汉书》卷八一《匡衡传》记司隶校尉骏、少府行廷尉事忠劾奏匡衡语。

^② 《后汉书志》卷二四《百官志·司徒》注引《汉旧仪》，个别文字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汉官旧仪》校改。

^③ 《后汉书志》卷二六《百官志·少府》。

^④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

^⑤ 《汉书》卷八《宣帝纪》。

^⑥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载：“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管诸会计事”。

郡国计吏在上计期间还有许多活动。最重要也是最常参加的是正月旦会。蔡质《汉仪》记：“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郡计吏，皆【陛】觐，庭燎。宗室诸刘杂会，万人以上，立西面。……计吏中庭北面立”^①。谢承《后汉书》卷七《郭宏传》亦载：“郭宏为郡上计吏，正月朝觐，宏进殿下，谢祖宗受恩，言辞辩丽，专对移时。天子曰：‘颍川乃有此辩士耶？子贡、晏婴何以加之！’群公属目，卿士叹伏”。当然，像郭宏那样有机会与天子专对的毕竟是极少数。

正月旦有时还会因皇帝的出巡而被推迟。如《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公元前107年）武帝南巡，“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冬十月，行幸泰山。……春还，受计于甘泉”。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

遇有大丧，则要会临。“百官五日一会临，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国上计掾史皆五日一会”^②。有时还参加宗祀大典。《后汉书志》卷四《礼仪志》即载会陵之仪：“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礼乐阕，君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

皇帝的借出巡机会亲自“受计”或让郡国计吏参加宗祀大典，都只是仪式性的活动，表示皇帝对郡国上计的重视，对郡国子民的关怀，同时也表示子民对皇室的拥戴。

真正有意义的是，朝廷通过郡国上计吏了解民情。史载：西汉宣帝年间，曾“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③。元寿二年（公元前2年），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汉哀帝也曾“亲问百姓所疾苦”^④。

《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载：黄霸为丞相时，曾“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事，黄霸让郡国守丞长史“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黄霸将郡国上计守丞、长史，按其应答询问情况，分成三辈，乃别出心裁之举，后亦为京兆尹张敞所谏阻，但丞相等杂问郡国上计吏地方情况应为常规。

一些有见识的郡国上计吏，也能利用这个机会发表意见。《汉书》卷八九《循吏·王成传》即载，西汉地节（公元前69～公元前66年）年间，王成为胶东相，“治甚有声”，赐爵关内侯。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就有郡国上计吏认为王成事迹不实。

《东观汉记》卷一四《张堪传》亦载：“上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蜀郡计掾樊显进曰：‘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上闻叹息。以（樊）显陈堪行有效，即除鱼复令”。东汉灵帝光和三年（180），灵帝欲大发兵讨“巴郡板楯蛮”，“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⑤。汉中上计程包以为板楯蛮曾有功朝廷，只是因为赋役苛重，以致叛戾。“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灵帝从其言，“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⑥。郭宏为上计吏时，“朝廷问宏颍川风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贤将相儒林文学之士”，郭宏亦“援经以对，陈事答问，出言如浮，引义如流”^⑦。郡国

^① 《后汉书志》卷五《礼仪志》注引蔡质曰。

^② 《后汉书志》卷六《礼仪志》。

^③ 《汉书》卷八九《循吏·王成传》。

^④ 《后汉书志》卷二四《百官志》注引《汉旧仪》。

^⑤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

^⑥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

^⑦ 《太平御览》卷463引谢承《后汉书》卷七《郭宏传》。

上计吏有时还利用机会主动上书,甚或推荐人材。如东汉顺帝时,庞参为太尉,录尚书事。“是时三公之中,参名忠直,数为左右所陷毁,以所举用忤帝旨,司隶承风案之。时当会茂才孝廉,参以被奏,称疾不得会”。上计掾广汉段恭因会主动上疏,为顺帝所采纳。“书奏,诏即遣小黄门视参疾,太医致羊酒”^①。山阳金乡人范式,为人多诚信,闻名远近。“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上书表式行状”,因致“三府并辟”,不就,后“举州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仕至“庐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②。东汉末,河东襄陵人贾逵“为郡吏,守绛邑长”。郭援之攻河东,所经城邑皆下,逵坚守,力屈城陷,贾逵宁死不降。时孙资“举河东计吏,到许,荐于相府曰:‘逵在绛邑,帅历吏民,与贼郭援交战,力尽而败,为贼所俘,挺然直志,颜辞不屈,忠言闻于大众,烈节显于当时,虽古之直发据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诚时之利用’”。后举茂才,除浞池令,历任弘农太守,丞相主簿^③。东汉末,耿勋“奉贡上计”,也曾“廷陈惠康安遇之谋,上纳其谏”^④。

东汉计吏秩级很低,之所以有机会对朝政发表见解,一是因为他们是郡国的代表。二是因为郡国上计吏是秦汉时期朝廷与地方下情上达的重要渠道。

西汉,朝廷与地方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主要靠郡国守丞、长史的上计,与州刺史的岁尽赴朝奏事。两汉刺史的秩级,除西汉成、哀、王莽时期和东汉末年外^⑤,和郡国守丞、长史一样都是六百石。州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⑥。州刺史是监察官,主要是监督郡国官吏,以六条问事,不理民政。平均每一刺史负责8~9个郡。因其不理民政,所以对地方政权的财政经济情况的了解,远不如负责上计的郡国守丞、长史。因此,在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方面,州刺史的作用仍不如负责上计的郡国守丞、长史^⑦。东汉光武帝以刺史每岁“道归烦挠”为由,“故时止勿奏事”^⑧,以后便成为定制。刺史既不再岁尽赴京奏事,郡国上计在朝廷与地方之间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中的作用,自然就更加突出。

3、郡国计簿的内容

《后汉书志》卷二八《百官志·州郡》载:郡“属官,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侯国之相,秩次亦如之。本注曰: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胡广于此条之下又注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后汉书·百官志·州郡》与胡广注都谈到上计事,但都不够具体。尹湾出土的东海郡《集簿》(稿本)则给我们展示了郡国集簿的具体内容。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前后编制的东海郡《集簿》(稿本)是我国目前仅见的一件郡国《集簿》(稿本),弥足珍贵。

尹湾六号汉墓一号木牍正面(顶端有《集簿》两字。行数为笔者所加):

- (1) 县、邑、侯国卅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其廿四有俟。都官二。
- (2) 乡百七十,口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正二千五百卅二人。
- (3) 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邮卅四,人四百八如前。

^① 《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

^②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范式传》。

^③ 《三国志》卷一五《贾逵传》及其注引《孙资别传》。

^④ 《全后汉文》卷102《太守耿勋碑》。

^⑤ 《后汉书》志二八《百官五》载:“(司隶校尉)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诸州,无有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

^⑥ 《后汉书志》卷二八《百官志·州郡》。这里说的“初”,指的是西汉时期。

^⑦ 上引《后汉书志》卷二四《百官志·司空》引《汉旧仪》记载称:“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要“守丞、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⑧ 《后汉书志》卷二八《百官志·州郡》注引《东观书》记张酺上言。

- (4) 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如前。
- (5) 县三老卅八人，乡三老百七十人，孝弟力田各百廿人，凡五百六十八人。
- (6) 吏员二千二百三人：太守一人，丞一人，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十人，啬夫一人，凡廿七人；
- (7) 都尉一人，丞一人，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五人，凡十二人；
- (8) 令七人，长十五人，相十八人，丞卅四人，尉卅三人，有秩卅人，斗食五百一人，佐史、亭长千一百八十二人，凡千八百卅人；
- (9) 侯家丞十八人，仆、行人、门大夫五十四人，先马、中庶子二百五十二人，凡三百廿四人。
- (10) 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其户万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
- (11) 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卅三，其四万二千百五十二获流。
- (12) 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二口……人如前。”

一号木牒背面

- (13) 口邑居园田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口，口十九万百卅三，……卅五万九千六……
- (14) 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口十口顷，多前千九百廿顷八十二亩。
- (15) 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二人，女子多前七千九百廿六。
- (16) 年八十以上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一，六岁以下廿六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凡廿九万六千四百五十九。
- (17) 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十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
- (18) 春种树六十五万六千七百九十四亩，多前四万六千三百廿亩。
- (19) 以春令成户七千卅九，口二万七千九百廿六，用谷七千九百五十一石八斗口升半升，率口二斗八升有奇。
- (20) 一岁诸钱入二万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六钱。
- (21) 一岁诸钱出一万^①四千五百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一。
- (22) 一岁诸谷入五十万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少口升，出卅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口口升

《集簿》第1行为东海郡所辖县级单位数目。“都官二”指的是有盐官与铁官两种。据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有伊卢、北蒲、郁州等3个盐官，有下邳等2个铁官（另一铁官之名因牒文模糊，无法辨认）。

第2行为乡、里之数及其现已配备的人数。第2行的缺字，指的是人，即主乡政者，与同行的“里正”相对应。“如前”，表示同于上一年度。170乡，主乡政者仅106人，说明乡官缺置者不少。2534里，而现置里正2532人，说明里正少有缺置者。

第3行为邮、亭之数及其现已配备的人数。平均每邮置邮人12人，每亭约置卒4人。“乡”与“里”单独一行，上承县、邑、侯国。“亭”与“邮”也单独一行，独立于“乡”、“正”之外。表明“乡”、“里”与“邮”、“亭”不同系统。“乡”、“里”为基层行政组织。“邮”、“亭”置于交通线上，“邮”主传递公文与交通事宜，“亭”负责维持治安与有关治安事宜，具有准军事性质。

第4行为该郡东西、南北的坐标距离^①。

第5行为县、乡“三老”数，与全郡“孝悌”、“力田”之数。《汉书》卷一《高帝纪》记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二月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集籍》记县三老38人，正是每县、邑、侯国1人；乡三老170人，正是每乡1人。“孝”、

^① 参见杨际平《从东海郡〈集簿〉看汉代的亩制、亩产与汉魏田租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

“悌”与“力田”各 120 人^①，平均每县（邑、侯国）各 3 人多，若以乡计，则每乡不足各 1 人。这各 120 人的“孝”、“悌”与“力田”，不知如何产生。

第 6~9 行为吏员数。其中第 6 行为全郡吏员总数与太守府吏员数。第 7 行为都尉府吏员数。第 8 行为诸县、邑、盐官、铁官的吏员总数。第 9 行为侯国吏员总数。这里将侯国吏员数目单列，很引人注目。《集簿》中仅具该郡吏员总数，具体情况则见于同墓出土的二号木牍《东海郡吏员簿》与三号木牍《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吏员簿》与《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很可能也是《东海郡集簿》的附件。

县、乡三老以及郡、县、邑、侯国的“孝”、“悌”、“力田”与郡、县、邑、侯国吏员分列，表明县、乡三老不在“吏员”范围之内^②。县、乡三老为县、乡“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助地方政府掌教化，在官、民之间起沟通作用，属于地方政府的优礼对象。从赋役制度角度讲，他们可免徭戍之役。“孝悌”与“力田”是地方政府树立的道德模范与勤劳的模范，人数较少，应该亦可免徭戍。

第 10、11 行为户口数。“获流”表示检括流民附籍。是年东海郡包括新附籍的 11662 户流民在内，仅比上一年度多 2629 户，说明是年该郡新逃亡的农民不少。

第 12 行为该郡总面积。

第 13 行为该郡邑居、园田面积。

第 14 行为该郡种宿麦（冬小麦）的面积。“多前”的顷亩，表示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的种宿麦面积。说明当时大力推广种宿麦。

第 15 行为该郡男女口数。女口“多前”7926 人。男口增减数字则缺漏。

第 16 行为年 80 以上与年 6 以下之口数。汉代，6 岁以下为幼弱，统计 6 岁以下口数，与口钱的征敛有关。汉初“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③，汉武帝曾一度将纳口赋钱的上限提高到 3 岁。汉元帝时，根据贡禹的建议，恢复为 7 岁起征^④，东汉因之。永始四年前后编制东海郡《集簿》时，正是 7 岁起征口钱，6 岁以下免征。第 16 行的年 80 以上与第 17 行的年 90 年以上都是老年人中的尤年老者，属于优恤对象。如汉文帝元年著令：“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罪有耐以上，不用此令”^⑤。汉武帝建元元年（前 139 年）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⑥，元狩元年（前 122 年）四月又“赐民年九十已上及鳏寡孤独、三老、孝悌、力田帛各有差”^⑦。东汉阳嘉三年（134）五月诏“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⑧。建和二年（148）正月，“年八十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绵三斤”，永兴二年（154）冬，“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赐所过道傍年九十以上钱，各有差”^⑨。东海郡《集簿》记录年 80 以上、90

^① “孝”、“悌”应分计，说见高敏《〈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二》，《史学月刊》1997 年第 5 期。

^②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载：“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后汉书志》卷二八《百官志》记：“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都把乡三老与乡官相提并论，极易造成乡三老为乡官之一的误解。

^③ 《汉书》卷七《昭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

^④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⑤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⑥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⑦ 《前汉记》卷一二《武帝纪》。

^⑧ 《后汉书》卷六《顺帝志》。

^⑨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以上的人数，当与这些人属优恤对象有关。汉代对7岁以下的幼者和80以上的老者，在刑法诉讼方面也有一些特殊规定，如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规定，“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成帝鸿嘉元年（前20年）定令：“年未及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①。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正月又诏：“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②。但《集簿》之登记7岁以下，80以上老者的口数，应与此无关。

第17行所登录的年70以上“受杖”者，也是属于优礼对象。《后汉书志》卷五《礼仪志》记“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木牍也记有汉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诏令：“高年受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於节；有敢妄骂詈殴之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郎第，行驰道旁道。市卖复毋所与，如山东复。有旁人养谨者，常养扶持，复除之。明在兰台石室之中。王杖不鲜明，得更缮治之。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部游徼吴赏使从者殴击，先用詔。地太守上谏，廷尉报，罪名明白，赏当弃市。制诏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官廷不趋，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③。受王杖者既须“铺之糜粥”，且不仅复除本身市买等，其某些侍丁亦得免役，故需要于《集簿》上加统计。据东海郡当年《集簿》，该郡年80、90以上者就有45541人，若加上年70以上者，估计有10万人上下，其中男口约5万人左右，而受王杖者仅有2823人。可见，在70以上的老人中，受王杖者的比例大约只有5%上下。

第18行为春季种植的面积。“春种树”之“树”为动词，不作“树木”解，说见王子今、赵昆生《尹湾〈集簿〉“春种树”解》^④。春种的作物应包括夏收作物与秋收作物两种，而以后者为主^⑤。前引第14行的“宿麦”为冬种夏收作物。此行主要为春种秋收作物（粟、黍之类）的种植。两项加起来，正好反映了全年的农业生产情况^⑥。春种“多前”46320亩，说明该郡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第19行为该郡依春令成户的户口数与所用谷物之数。此项记事的含义尚不清楚。从字面上看，所谓“成户”，也就是“立户”之意。它可以指原住民中因分家析产而新立之户，也可以指流民附籍新立之户。此条，7039户，27926口，户均约4口，户均用粮1.1石，人均用粮0.28石。原住民中因分家析产而新立户，自不必由国家拨粮资助^⑦。该年度流民附籍计11662户，也超出“以春令成户”数甚多。流民附籍，需要政府资助，户均1.1石之粮也显得太少。而且，如果是安置流民，也不必专记“春天”安置流民流民之数。我们猜测，本条之“以春令成户”应为“以春令行户”之误。《后汉书志》卷二八《百官志》载：“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⑧。《集籍》此行所记当为东海郡太守当年行春所接触的农户数与“振救乏绝”用粮数。

第20~22行为该郡该财政年度钱谷出入的总数。推测应有分项目的明细簿作为附件^⑨。

①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②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

③ 见《考古》1960年第九期。

④ 《历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⑤ 这里所说的“春种树”，在时间上不宜作机械理解，夏初播种的作物应该亦可包括在内。

⑥ 秋收作物的种植面积数倍于“宿麦”的种积面积，符合当时的农业生产实际。

⑦ 户均1.1石之粮，对于新立户者来说，数量太少，毫无意义。

⑧ 《后汉书》卷八二上《谢夷吾传》，《后汉书》卷67《杜密传》，《后汉书》卷七六《许荆传》，《后汉书》卷三三《郑弘传》、《周章传》等也都提到太守行春事。

⑨ 《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五帝本纪》载：众利侯郝贤“元狩二年，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上计谩，免”。此“戍卒财物”簿亦应是计簿的附件。前引《汉书》卷八一《匡衡传》有关匡衡封地界至事谈到“至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说明郡国辖地发生变动时，可能还要以新的郡国界至图作为计簿的附件。

该件所记的钱谷收入即包括田租、口赋、盐铁专卖收入等等的全郡的财政收入。钱谷的支出，即该郡的全部的财政支出。这项财政支出，应由朝廷从该郡财政收入总数中划拨预留。收支相抵后的余数，才是实际上缴朝廷的财政收入。

从上引《东海郡集簿》可以看出，当时的《集簿》（或曰《计簿》）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该郡行政编制（所辖的行政单位、幅员，与官吏配备等）的基本情况；二是户口、垦田情况；三是钱谷收支状况。该件既是该郡的《集簿》，包括该郡行政编制的基本情况是很自然的。户口与垦田是当时经济发展程度的主要指标。钱谷出入则是当时财政收支的主要内容。两者都是郡国《集簿》的最主要的内容。换言之，当时的集簿所反映的主要就是郡国的财政、经济情况^①。《集簿》的主要功能是使朝廷掌握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情况为编制来年财政预算作准备，同时它也是朝廷对郡守进行考课的依据之一^②。

上引《后汉书·百官志·州郡》胡广注与东海郡集簿相比，明显多了“盗贼多少”一项。所谓“盗贼多少”指的应是发生各种刑事案件的数量。《东海郡集簿》首尾不缺，其中并无当年东海郡各种刑事案件的统计数据。说明汉代《集簿》本来就不包括“盗贼多少”这一项。但《汉书》卷七四《魏相传》记，魏相为丞相时曾上奏：“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又说明，当时上计的资料中，确有各类刑事案件的统计数据^③。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秦汉时期郡国上计的资料，除总的《集簿》外，还应有许多附件。附件之一就是有关各类刑事案件发生、破案与审结情况^④。《汉书》卷一一四《百官志·司空》引《汉旧仪》曰：“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曰：……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朝廷要郡国守丞、长史回答“今岁善恶孰与往年”、“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说明“盗贼多少”不在郡国上计的“集簿”中。否则，朝廷就不会在受计时再要郡国上计守丞、长史汇报此事。

居延汉简 35·8A 记：“阳朔三年九月癸亥朔，壬午，甲渠鄯守候塞尉顺敢言之，府书：移赋钱出入簿，与计偕。谨移应书一编，敢言之”^⑤。这里所说的“府”应为郡太守府或都尉府。甲渠鄯守候塞根据“府书”指示上报的“赋钱出入簿”，既然是“与计偕”，就说明它本身只是郡国“集簿”的附件。《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众利侯郝贤条记：“元狩二年，（郝贤）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上计谩，免”。这里所说戍卒财物簿，也应是作为上谷郡“集簿”的附件。

《续汉书·百官志》宗正条注：“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上引东海郡《集簿》未见“宗室名籍”，可见郡国每岁“因计”所上的“宗室名籍”也是作为郡国“集簿”的附件。

宗室名籍报宗正，边郡屯戍区的簿算，由大司农部丞掌管^⑥。有关刑事案件的情况，很可能是呈廷尉（大理）。

^① 《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记：魏文侯时“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新序·杂事》记：魏文侯时“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大夫毕贺”。《新书》卷六《礼》记：“受计之礼，主所亲拜者二：闻生民之数则拜之，闻登谷则拜之”。所反映的也都是经济与财政方面的内容。

^② 上计与考课虽然有联系，但毕竟是两回事。郡国上计主要是汇报郡级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绩，考课则是对官吏个人的贤能与否进行考核。郡国集簿反映了郡级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绩，从而也间接体现了郡国主官即郡守、王国相的经济政绩，但尚不能全面体现郡国主官个人的功过能否，更不能具体体现郡丞、王国长史个人的功过能否。因此，郡国集簿还不是朝廷对郡国长吏（郡守、郡丞、王国相、王国长史）考课的主要依据，而只是参考依据。对郡都尉、都尉丞的考课，似乎还应单独进行。至于对郡太守府属吏、郡都尉府属吏的考课，估计应由郡守、郡都尉主持。

^③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此类数据应该也是根据各地上报资料汇总起来的。

^④ 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亦认为“可能随《集簿》呈上的另有专门统计‘盗贼多少’的附件”。

^⑤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 55 页，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⑥ 葛剑雄《秦汉的上计和上计吏》（《中华文史论丛》1982 年第二辑）已指出：“特殊的项目由有关部门接收，如宗室名籍报宗正；边郡屯戍区的簿算，由大司农部丞掌管”。

《后汉书·百官志·州郡》所记与胡广注，还有一点需要辨析，这就是县这一级是否也造《集簿》上计于郡国的问题。《后汉书·百官志·州郡》谈到县令长、侯国相“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胡广注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都谈到秋冬岁尽，县令长与侯国相要上计于郡国。今人据此亦多认为汉代的上计分为县级上计于郡国与郡国上计于中央两级^①。

我们认为，秦汉时期，县、乡有“计”，有“簿”，郡国上计的《集簿》，各种统计数据来自各县的统计数据，县的统计数据来自于乡，乡的统计数据来自于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不等于说，县有《集簿》上计于郡国，乡有《集簿》上计于县。先秦秦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言及“上计”不少，但除上引《后汉书·百官志·州郡》及胡广注外，仅见《吕氏春秋·知度》记：“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於襄子”，与《秦律·仓律》规定：“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餽食者籍”等。但《吕氏春秋·知度》与《秦律·仓律》所言都是在实行郡县两级制以前之事。时“郡”不统县，“郡”与“县”平衡，所以县级上计直达朝廷^②，与两汉时期郡国向中央上计一样。由此两例皆不足以类推秦汉时期县要造集簿“上计”于“郡”。

秦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言及“计吏”者亦复不少，但这些“计吏”无一例外都是受郡国派遣“上计”于朝廷，绝未见受县司派遣“上计”于郡国者。

目前所见的秦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都并未见县编造“集簿”，“上计”于郡国的实例。汉制，郡守“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罪法，论课殿最”^③。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④。郡县的主要官吏每年至少会面两次，似乎也不必像郡国上计于朝廷那样，上计于所属郡。汉代“计断九月”，九月之后，岁尽之前，郡国便要向朝廷上计。路途遥远之郡国，计吏十月便要上路，从时间上看，似乎也等不及县邑“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要言之，秦汉史籍所说的上计，都是指郡国向中央政府的“上计”，而不是县向郡国，郡国向中央政府的两级上计。《后汉书·百官志》及其胡广注很可能是将属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误认为属县向郡国的上计。

最后还要谈谈计簿不实问题。汉书的上计制度相当严密，对安排国家财政预算起到良好的作用。但也存在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汉武帝就以“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责备丞相石奋失职^⑤。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二月汉宣帝诏也谈到“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⑥。汉元帝朝，御史大夫贡禹也说过，汉武帝“功大威行，遂从奢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汉武帝与汉宣帝时期都是吏治较好的时期，《计簿》仍有不实情况，吏治败坏时期，就更不必说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汉代上计制度的作用时，不能不注意这一情况。

主要参考文献：

张桂萍《汉代的上计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一期。

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一期。

韩连琪《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文史哲》1978年第三期。

^① 参见韩连琪《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文史哲》1978年第三期；葛剑雄《秦汉的上计和上计吏》，《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二辑；张桂萍《汉代的上计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一期；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一期。

^② 其时赵襄子已主赵政。

^③ 《后汉书志》卷二八《百官志·州郡》。

^④ 《后汉书志》卷二八《百官志·州郡》胡广注。

^⑤ 《汉书》卷四六《石奋传》。时“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

^⑥ 《汉书》卷八《宣帝纪》。

葛剑雄《秦汉的上计和上计吏》，《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二辑。